



武昌起义的故事

志杰編寫



羣益堂出版

武昌起义的故事

志杰 編 寫

羣益堂出版

1956年·武漢

武星起义的故事

字数：26,000

編寫者： 志 杰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4號)

出版者： 羣 益 堂

(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武 漢 發 行 所

印刷者： 建 新 印 刷 廠

開本：787×1092 $\frac{1}{32}$

1956年8月第1版

印張：2

1956年8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71108·1

印數：1—18,000

目 錄

一	全國人民的反清怒潮	1
二	武昌革命組織的成長	8
三	斗爭中的文学社	17
四	十月十日的起義	26
五	武昌革命政府的成立	35
六	漢陽、漢口的光復	42
七	武漢的保衛戰	46
八	袁世凱獨吞革命勝利果實	51

一 全國人民的反清怒潮

一九〇〇年爆發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在帝國主義和清朝政府相互勾結的屠殺下，悲慘的失敗了。腐朽的清朝政府，出賣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和帝國主義訂立了辛丑條約，允許帝國主義在中國享有許多特權，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侵略和政治侵略，同時還直接參加剝削中國人民的勾當，這樣就使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加深了。

十九世紀的末期，世界資本主義開始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帝國主義。從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開始，各個帝國主義在中國展開了劇烈的爭奪。到辛丑條約以後，帝國主義更加大規模的積極向中國投資。他們在中國境內開設工廠，建築鐵路，開辟內河航運，駐扎軍隊，組織資本雄厚的銀行，在一定的勢力範圍內，控制着中國的經濟命脈。但是在對中國進行野蠻

的掠奪中，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尖銳起來了。當時，日本和帝俄為了爭奪滿洲的權利，彼此互相傾軋和排擠。一九〇二年，日本與英國訂立攻守同盟，以對付帝俄，使日、俄在滿洲的矛盾由暗鬥進入到公開的戰爭。一九〇四年，日本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慫恿下，用不宣而戰的方式與帝俄開戰。戰爭是在中國境內進行的，但清朝反動政府卻不顧數千萬人民的生命財產，竟無恥的表示保守中立，不敢提出抗議，並且還給他們劃定戰區。由於清朝政府對帝國主義的容忍和屈辱，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當時凡是有戰爭的地區，人民流離失所，哭聲遍野。

反動的清朝政府，在它的最後十年中，為了維持那將要垮台的腐朽統治，更加無恥的投靠帝國主義，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完全成為了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的工具。每年清政府要從人民身上搜刮大量的白銀，送給帝國主義作為債息和賠款；清政府還把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人民，以反抗政府的借口來加以屠殺。革命宣傳家陳天華在“警世鐘”這本小冊子裡曾經說：“列位，你道今日中國政府還是滿洲政府的

吧？早已是各國的了。那些財政權、鐵道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洋人全不要費力，要怎麼樣，只要下一個號令，滿洲政府遂立刻奉行……他拿定‘寧願以天下送給朋友，不把天下送給奴隸’的主見，任你口說出血來，他总是不理。”同時他又在“猛回頭”一書里說：“……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哪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我們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說我們與洋人作對，反說我們與現在的朝廷作對，要把我們當做謀反叛逆的殺了。列位，我們若不把這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難道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么？”

可見清朝政府在最後的十年，已經成了“洋人的朝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表人。由於帝國主義的殘酷壓迫，和統治階級窮凶極惡的搜刮，農村經濟遭到了徹底的破壞。農民非常貧困，常年都在飢餓的境遇中，過着慘痛非人的生活。這些走頭無路的農民，他們對帝國主義和清統治者凶惡的面目，看得比以前更加清楚了。全國各地農民，不斷的、自發的起來暴動，反抗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掠奪和迫害。這些暴動雖

然有的規模很大，但还是比較缺乏組織的，因此終于失敗了。如一九〇四年七月，江西樂平縣的人民，為了反抗地方官吏勾結豪紳對當地土產增加捐稅，就在夏廷義的領導下，舉行了轟轟烈烈的抗捐暴動；廣西歸順縣，有許多村鄉反對抽捐的暴動；河南葉縣，因縣官一年內抽捐七次，激起了全縣人民的憤怒，展開了規模宏大的反官稅暴動；一九一〇年四月，湖南由於連年遭受水災，農民忍飢挨餓，而當時地主豪紳，却囤積糧食，勾結洋人、官府，抬高糧價，反對舉辦平糶，使久困飢餓的農民，被迫投河自殺，因而激起了人民的憤怒，爆發了震動中外的長沙“搶米”風潮；同年山東萊陽縣，也因降霜太重，庄稼大半受害，地主、富商乘機囤積，農民吃食樹皮草根，而官府却趁機逼迫人民繳納人口稅、牲畜稅，爆發了反貪官土豪的鬥爭。

農民在這些鬥爭中，殺死了平日最痛恨的官吏、地主、土豪、外國傳教士，拆毀了統治者壓迫和剝削他們的統捐局、厘卡、衙門、教堂等機構。在鬥爭中，農民們顯示了無比的英勇，他們對帝國主義、封建統治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雖然在每一次鬥爭中，都遭到統治者殘酷的屠殺，

但人民並沒有被吓倒，反抗運動仍在不斷的爆發，而且規模一次比一次大。

清朝政府百般的順從洋人，無恥的奉行着出賣國家工礦富源的政策，國內正在成長中的民族資本，在帝國主義經濟的壓迫和排擠下，遭到了破產。因此清朝統治者在這一方面，與廣大人民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矛盾也日漸尖銳化起來了。一九一〇年先後爆發了直隸、山西、河南的煤礦風潮，山東沂水的金礦風潮，雲南七縣的礦山風潮，江蘇、浙江、上海的航權風潮，東三省主權的收回風潮，四川、湖北、湖南、廣東省的爭路風潮等等。在這些鬥爭中，工人階級都是積極參加，他們不僅反對腐朽的清朝政府，並且也把鋒芒指向帝國主義。

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銳的情況下，清朝統治者一方面用殘酷的屠殺手段來鎮壓人民的起義，另一方面還利用舉辦新政和“立憲”的幌子，來拉攏一班還對清朝懷着幻想的改良主義分子，想借以緩和國內人民的反抗情緒，來挽救這面臨崩潰的危局。但“立憲”並不是統治者甘心情願的，而是一種用來欺騙人民的手段，所以統治者總是想盡一切方法來拖延

敷衍。一九〇八年，清朝政府被迫公布了一个保障清朝永久统治的“憲法大綱”，把預备時間定为九年。这样一來，使許多过去对清朝还存在着幻想的人，也感到很大的失望；欺騙人民的立憲把戲，很快的在人民面前破產了。这时覺悟了的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多由同情革命而参加了革命，因此反清的統一戰綫，逐漸成長和壯大起來了。

早在公元一八九四年，孙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团体——兴中会已經成立，由于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到一九〇五年和全國各地的反清組織，在日本組成了統一的革命組織——中國同盟会。当时中國同盟会是一个全國性的革命聯盟，在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影响下，提出了比較明确的、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革命綱領，提出：“驅除韃虜，恢复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权”。这使中國当时的革命，進入了一个新的階段。但是同盟会的領導并不是很坚强有力的，它还没有力量能够領導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同盟会各革命团体，虽然都以反清为目的，但对反清以外的政治思想并不一致，他們的思想 and 行动給以后的革命帶來妥協讓步的因

素，因此这个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从革命开始时就决定了它的前途。

同盟会成立以后，就号召各省党人分别回到本省从事革命工作，当时在东京的湘鄂两省党人，都紛紛回國參加革命。湖北当地的革命党人，从事革命工作是非常活躍的，他們以武漢为中心，大部分都投身清政府的新軍，組織群众和新軍參加革命，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由于他們長期的在群众和新軍中進行革命宣傳工作，团結了農民出身的湖北新軍，使当时清朝政府在湖北地区作为鎮压人民的反动武裝轉化成为革命的武裝，給武昌起义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礎，使辛亥革命能够很快的得到勝利。

二 武昌革命組織的成長

武漢位置在長江的中游，當南北交通的要衝，是我國內地十分重要的城市。因此清政府就在武昌訓練軍隊，裝備西洋的新式武器，建立新的反動武裝，企圖把武漢作為鎮壓人民的基地。當時清統治者為了使新軍能夠具有較好的戰鬥力，便把原有沾染惡習的老弱兵士裁掉，另外招募一些年壯識字的人當兵，並且創辦陸軍特別小學，着手培養軍隊中的低級幹部。湖北、湖南各地許多革命黨人和有志青年，都紛紛參加了新軍，後來這些人大多成為武昌起義中的骨幹分子。

這時國內由於新式的學校逐漸增加和學生的出國留學，使西洋包含着民主與科學思想的新知識，也不斷的輸入國內，並且很快的傳播到全國。清政府也以舉人、進士等頭銜贈送給留學生，想借此來籠絡他們。但是這些青年知識分

子，看到帝國主義在中國橫行霸道，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他們歸國後很快的成了革命思想的傳授者和革命行動的組織者。湖北地區是當時革命思想獲得廣泛傳播的地區。一九〇四年六月，愛國青年劉靜庵、張難先、時功璧、胡瑛等人，以研究科學為掩護，在武昌多寶寺街組織了“科學補習社”，進行革命活動，這就是湖北革命組織的初次出現。為了取得武器和運動士兵，科學補習社便派青年同志張難先、胡瑛等數人，先後投入武昌第八鎮工兵營當兵，連絡新軍中的先進分子，以建立革命組織。他們參加新軍後，利用各種機會向兵士宣傳革命道理，激發士兵們的愛國思想；並且向士兵散發“猛回頭”、“黃帝魂”等通俗書籍，使兵士從書中認識到祖國的偉大、歷史的悠久，近來的民窮國弱完全是清朝政府屈膝帝國主義的結果。他們在新軍中長期工作，確實收到很大的效果，革命種子很快的在新軍中傳播着，當時有不少熱愛祖國的青年兵士，受到革命的影響以後，都紛紛參加革命，使新軍成為革命活動的大本營。

當武昌科學補習社進行革命活動的時候，湖南留日學生黃興、楊篤生、陳天華等人在長沙

組織華興會，領導湖南地區的革命活動。科學補習社便派宋教仁往湖南連絡華興會，以便取得充分的合作。雙方發生關係不久，華興會就聯絡會黨，準備在一九〇四年舊曆十月初十，趁西太后做壽的那天，分長沙、岳州、常德、衡州、寶慶五路舉兵奪取湖南，號召各省起義。但因消息洩露，大劣紳王先謙告發于巡撫陸元鼎，華興會在長沙所領導的東文講習所遭巡警搜查，各地大肆逮捕革命黨人，使湖南各地成為恐怖世界。湖南巡警在搜查中，發現了湖北科學補習社也是革命團體，於是馬上打電報通知湖北官府捕查，幸虧湖北方面早已得到華興會通知，把社中一切有關的秘密文件焚燒了，使巡撫搜查一無所得。從此以後，科學社人員被武昌官府監視很嚴，稍有不慎，隨時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因比革命活動被迫暫時停頓。

不久革命黨人曹亞伯來武昌，會晤了劉靜庵等，商議再建立革命組織，進行革命活動。他們為了避免統治者的迫害，借聖公會的日知會為革命機關，這是武昌再一次革命組織的出現。革命黨人在教堂附近，設立閱覽室，陳列着各種西洋的科學和宣揚民主的書籍，及國內進步的

書報雜誌等，在群眾中鼓吹革命，擴大革命影響；並且派人在新軍中和學校中進行活動，組織和建立革命據點。日知會在活動的兩年中，使武昌地區的革命活動比科學補習社的時期向前大大的邁進了一步。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湖南的革命黨人王永求和陳亞龍等，在瀏陽文家市領導群眾起義，聲勢浩大，當時孫中山便派胡瑛、梁鐘漢、朱元成等回湖北，準備響應瀏陽起義。但事先因流氓郭瑤階向胡瑛勒索款項沒有成功，便密告日知會為革命組織，於是武昌巡撫道馮啟鈞便封閉日知會，並且在武昌各地大肆逮捕。當時胡瑛、朱元成、梁鐘漢、李亞東、殷子恆、吳貢三、李雨霖等，都先後被捕下獄。清朝政府為了把革命黨人一網打盡，又在沔陽仙桃鎮捕張難先，又在黃陂捕劉靜庵，湖北各地革命黨人都感到人人自危，日知會就在這樣恐怖的气氛下被迫解散了。

雖然清朝政府對革命殘酷的摧殘，但革命活動還是沒有停止過，仍然在各種各樣的掩護下進行活動。一九〇八年三月，新軍四十一標三營任重遠、郭撫宸、王子英、秦炳鈞、黃紳彝、楊

王鵬、鍾畸、彭新振、章裕昆等又組織軍隊同盟會，但組織是比較渙散的。同年十一月湖北新軍往太湖會操，大家都感到全國革命已進入了新的高潮，為了配合革命形勢的發展，湖北地區有進一步加強革命組織的必要。于是在新軍返回武昌以後，由楊王鵬、鍾畸等十人組織群治學社，代替軍隊中的同盟會進行革命活動。

群治學社有一定的革命組織形式，成立時發表了宣言，在宣言中指出：近代中國人民所遭受到的慘痛災禍，完全是由於清朝政府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所造成的。因此組織群治學社的最終目的，是要喚起中國人民，推翻清朝，挽救中國。這表明了當時湖北地區的革命運動，已經大大的向前邁進了一步。群治學社吸取了過去的教訓，進一步加強和嚴密革命組織，他們在社章上規定凡是參加群治學社的同志，必需要履行一定的入社手續，申請加入的人要有社員三人以上的介紹，再由社里派專人調查，其調查情況要與介紹情況完全符合，而且夠入社的標準者，才可以接納入社。同時，還規定入社的人只限於士兵或者普通的学生。當時在新軍各營和武昌各校中，參加革命組織的人好像是

雨后春笋一般，其中以新軍四十一标和三十一标的士兵特別活躍，參加入社的人數也特別多。

一九〇九年七、八月間，群治學社中的楊王鵬參加了武昌新軍下士團考試，成績優良，被錄取為第一名，提拔為四十一标一營左隊司書生，成為新軍中的低級軍佐，從此群治學社突破了原來限于以兵士為發展對象的圈子，擴大到低級軍官中去了。楊王鵬擔任司書後，與隊官潘康時感情很好，他時常以進步思想和革命書籍影響潘康時，使潘康時傾向革命並參加了群治學社。這樣四十一标一營左隊就成了群治學社活動的中心了。

這一年，恰好長江發生水災，湖北所屬的天門、京山、監利、潛江、沔陽、公安、石首各縣，遭受了嚴重水災的農民無家可歸，到處流亡，有的全家因飢餓而死。但是清朝統治者不但不設法救濟災民，平除水患，反而為了防止農民暴動，由武昌調派新軍往各災區駐紮，以便進行鎮壓。十一、十二月，新軍相繼調往各地，於是群治學社由武昌城中進一步擴展到各地了。由於群治學社的成長和擴大，成為了武昌革命的領導核心，人心都向往着這個革命的組織。當時辦“商